

1941年,24岁的聂曦以少校衔来到吴石少将身边担任副官。这一任命,既是两位闽籍军人命运的交汇,也为一段隐秘同行的历程埋下伏笔。

一

福建是近代海军的摇篮。1935年,18岁的聂曦考入海军陆战队讲武堂。这为强化福建海防设于长门、马尾的学堂,是南京政府海军部培养基层指挥人才的基地。学员分陆战队中下级军官及军士两类,毕业后均授尉官。讲武堂课程以两栖作战为核心,结合福建沿海地形开展滩头登陆、要塞防御等专项训练。自陆战队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,聂曦历任排长、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。

粤桂江防司令部负责守护西江、珠江等粤桂交通命脉。1938年广州沦陷后,西江成为西南国际补给线桂越公路的重要依托,部队也随改编隶属于第四战区。1939年底,昆仑关战役中,江防部队在西江、邕江等水域布雷封锁航道,虽未阻敌进攻,却迟滞了其补给线,为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昆仑关战役是吴石军事生涯的重要节点。昆仑关作为南宁北侧天然屏障,1939年12月16日,桂林行营下达反攻命令,作战计划由吴石制定。他经大量情报收集与侦查,拟定缜密方案,指挥部队歼灭日军4000余人,击落击毁日机20余架,重创日军第五师团。

据挚友吴仲禧回忆,吴石每日清晨骑马、练武,风雨无阻,办公室内挂满军用地图,作战计划皆亲自草拟,其敬业与爱国精神一目了然。

同为闽籍,又并肩抗战同一战场,聂曦对这位才识卓越的前辈深为折服。吴石选聂曦为副官,既有乡亲情谊,更有对其人品才干的考察。聂曦6岁丧母、14岁丧父,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却永失依恃。聂曦心里,想必有着一位英雄的父亲之梦。他依姑母聂淑贞(嫁三坊七巷官巷杨氏)生活,这份孤苦让他更易对正直的吴石产生信赖。彼时,两人均未料到,这一追随竟直至生命终点。1950年,他们一同牺牲于台北马场町。

皖南事变后,吴石陷入苦闷,曾与何遂共同创作《长江万里图》(由何遂绘图、吴石题诗),以“共济安危托一舟”“秋风斜日更添愁”抒发忧思。聂曦的到来,为这位失意将领增添了可靠助力。

二

吴石(1894—1950),原名萃文,字虞薰。从他出生起,就生活

在一个国家多故,战火频仍的时代。少年时,他就仰慕为推翻帝制的黄花岗烈士们,把林觉民那句“为天下人谋

吴石与聂曦的并肩行

■陈碧

永福”读到投笔从戎,参加学生北伐军——17岁的吴石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。想必正是这个时候,他才改得此名。后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,与张治中等一众名将同期,年终及毕业考试均获全校第一,被誉为“军校状元”。1916年末,更是以同届800余人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保定军校毕业后,正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北洋军阀与地方兵团派系混战的时代。当时,因皖系军阀李厚基盘踞福建,吴石无用武之地,辗转于闽南民军、方声涛和李烈钧的征闽军等处。

1923年,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,拜闽籍大儒何振岳为师,学习诗词国学。同年,黄花岗起义幸存者方君瑛(方声涛姐)留学归国。她在法国过了10年清苦生活,猝然见到革命后社会腐败依旧,同志气节沉沦,百姓依然贫苦,留下“社会腐败,不可救药”的遗书自杀。此事更让吴石对时局深感痛心。

1927年,吴石应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邀请,从国民革命军中回闽,任军事厅参谋处处长。1929年,在方声涛支持下,吴石以该身份东渡日本,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、日本陆军大学。

留日期间,吴石“三年在校,片刻不懈”,战术方案常被教官作为范本印发,毕业成绩名列前茅,获“十二能人”美誉——能文能武、能诗能词、能书能画,兼通英日两国



林若茵图

语言,精骑射驾驶。

1934年,吴石学成归国,担任参谋本部厅长,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。他历时三年,依据日本书报及留日士官生提供的材料,编成《日本作战之判断》等十余种材料,合称《参二室蓝皮本》。1937年淞沪会战中,该书对日军兵力部署、攻击方向的预判精准无误,一时风靡前线。

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,日军投入三分之二兵力,意欲打通大陆交通线。吴石多次向中央请援,但因种种原因,遭遇“拒不发兵”。11月,桂柳失守,加之盟军“错峰”,造成近万军民丧生。他认清国民党腐败独裁的本质,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“接收大员”中饱私囊,货币崩溃、工厂倒闭、民不聊生。1946年,聂曦随吴石进入国防部史料局(1948年改史政局)任总务组中校组长。吴石于近处见证国民党腐败,痛心之余,越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林觉民“为天下谋永福”之信念。

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吴石在1946年书写《自传》,对往日之自己作了回顾和分析,想必就是此时已下了某种决心——1947年,吴石与中共华东局建立联系,走上隐蔽战线。

三

聂曦追随吴石期间,不仅是工作上的助手,更在日常中耳濡目染其人格操守。吴石清贫正直,对聂曦的影响远不止军事技能传授。吴石喜爱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,常教子女临摹,称其“字字铜筋铁骨”。

聂曦受其影响,亦将此帖奉为至宝“……刑不残,兵不黥。赤子无愁声,苍海无惊浪”的帖文意境。现在也渐渐成了他的精神追求。

吴石还用福州话教子女读《孟

子》,讲解“王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”。聂曦入伍前文化不高,父亲去世后便辍学从军,吴石的讲解让他对“仁义为本”有了深刻理

解。

1949年,福州解放在即,国民党急令时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将绝密档案运往台湾。这时,聂曦临危受命,将298箱绝密档案从于山戚公祠全部转移到仓山麦园路福建省研究院书库。福州解放后,这批关乎东南战局的档案安全移交,为后续工作保留了关键资料。

1949年8月,吴石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抵台,聂曦随行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。彼时,白色恐怖肆虐,陈布雷之女陈璉、婿裴永熙均被抓,在舆论下才未被施以极刑。

聂曦深知吴石的秘密任务后,全力协助。作为吴石最信赖的亲信,他代其联络各方、物色工作对象、索取核心材料。

聂曦与吴石并肩前行,从同乡情谊与对爱国情怀的敬重而选择沉默并掩护,至最后走上共同革命之路,是乡情、知遇之恩与共同信念交织的结果——这份信任,足以让他直面生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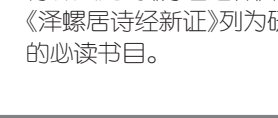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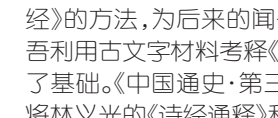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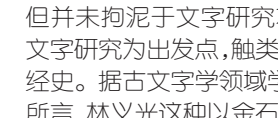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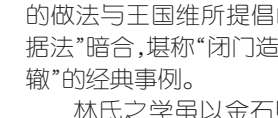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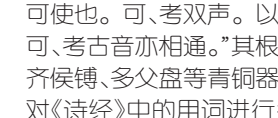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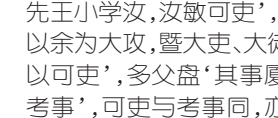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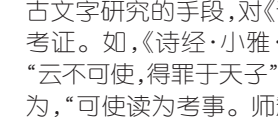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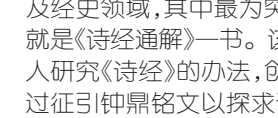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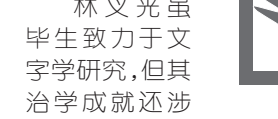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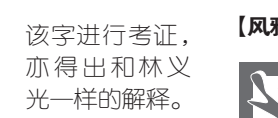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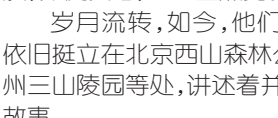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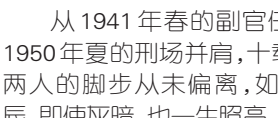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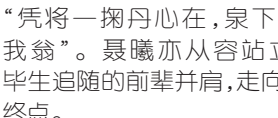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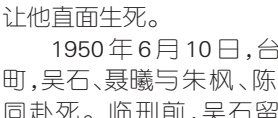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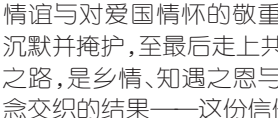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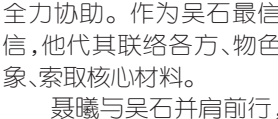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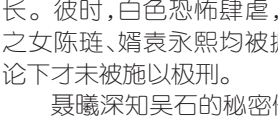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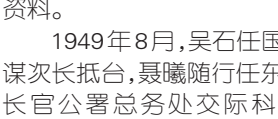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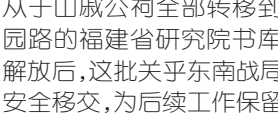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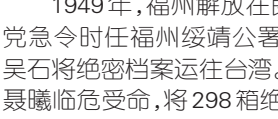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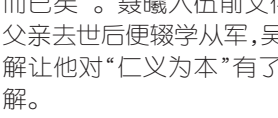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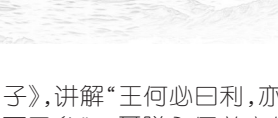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6月10日,台北马场町,吴石、聂曦与朱枫、陈宝仓一同赴死。临刑前,吴石留下绝笔“凭将一掷丹心在,泉下差堪对我翁”。聂曦亦从容站立,与他毕生追随的前辈并肩,走向生命的终点。

从1941年春的副官任命,到1950年夏的刑场并肩,十载光阴,两人的脚步从未偏离,如太阳星辰,即使灰暗,也一生照亮。

岁月流转,如今,他们的身影依旧挺立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、福州三山陵园等处,讲述着并肩行的故事。

闽江潮

【闽都新谭】



“小事”见态度

■李伟明

看古装戏,常见百姓击鼓鸣冤的场景。这是古人告状的主要方式。衙门外的那只鼓,叫“登闻鼓”。击登闻鼓,有诉求可以直达高层。就如现在的领导在信访局接访,群众有问题可以当面反映。

登闻鼓历史悠久。据史料记载,在晋武帝时期,就在朝堂外设置登闻鼓,允许百姓直接向朝廷告状。而类似做法,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,只不过未必叫这个名字而已。登闻鼓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省去中间环节,让百姓有机会与“大领导”面对面。后世有些皇帝比如朱元璋,就曾接待击打登闻鼓的百姓,以此防止“中梗阻”。当然,这种情况估计并不多,否则皇帝再勤政,恐怕也忙不过来。而到了清代,对击打登闻鼓设置了一些条件,寻常百姓就不一定有机会直接到朝廷鸣冤了,登闻鼓也就渐渐形同虚设。

按理说,告状到最高层,事情应该小不了。但凡事总有例外。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十七卷记载,北宋淳化四年(993)十月的一天,京郊地区有百姓击打登闻鼓,反映自家的猪不见了。宋太宗知道后,下令赐给申诉者一干钱抵偿猪价。宋太宗对宰相说:“这么小的事也要听理判决,真是太可笑了。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态度来治理天下,那就可以让世上没有什么蒙受冤屈的百姓了。”

宋太宗的后半句话,换到现在来说,不就是我们常讲的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吗?姑且不论那个失猪百姓的做法是否妥当,从执政者角度来说,以处理重要事情的认真态度来对待百姓的琐事(其实,很多事,在上层人士眼中是小事,在底层百姓心中却是大事),总不会有什么错。相反,如果认为小事不值得理会,持漠视态度,那么,哪天遇到大事,也同样会被习惯性忽略。

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把一件件小事办好,几经积累,便办成了大好事。对大多数人来说,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大事可办。我们遇到的事情,基本上都不

大。之所以有些人后来办成了大事,那是因为人家没有放弃干小事。有的人一辈子一事无所,是因为他好高骛远,一直在期待大事降临。但非常不巧,大事与他无缘。

对今天的干部来说,尤其要明白,群众遇到的小矛盾不处理,便可能演变成大问题。经常接访就知道,一些上访户的诉求,就是因为问题在萌芽状态时,相关人员没有认真对待,努力解决,导致小问题积压成了大问题,最终成了棘手的问题。接访的初始环节太重要了。

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,不是挂在嘴上说说的,要用实际行动把每一件事办好。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事情本身。化解了矛盾纠纷,就增添了发展力量。否则,一个地方如果纠纷不断,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这些事情上,哪有工夫发展经济?这种内耗,最不应该。表面上看,这是当回事的事,无人旁人利益。其实,真算起账来,也是人人买单,因为公共资源属于大家。

说到“小事”,《续资治通鉴》第二十四卷还记载了一件事。北宋景德元年(1004)七月,宰相李沆去世。书中专门记录了李沆的有关事迹,其中说道,宋真宗上位之初,李沆每天将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作乱的情况报给皇帝。参知政事(副相)王旦认为这些是小事,没必要打扰皇帝。李沆说:“天子正在少年之时,应当让他知道民间疾苦。否则,他不是留心声色犬马的享乐,就是搞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那一套。”在全沆看来,地方上的各种灾情虽然不是全局性的,但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,才不是小事呢。因此,不必担心打扰领导,该报告的就要及时报告。读史书,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记载。

“小事”见态度。只有重视百姓身上各种“小事”的人,心里才会真正装着群众利益。

女子本芬芳

——读赵玉明散文集《在时间的河里》

■刘爱玲

赵玉明是我的鲁院同学。

打开《在时间的河里》,近70篇散文分成三辑:“走读河口”“桂花馨香”“乘着歌声的翅膀”,饱含深情的文字在这个身有不便的女子笔下,密密编织。那年鲁院相别,几位要好的同学有一个美好约定,其中一个环节,是去福州看玉明。但对于我们这些困在身体里的残障者,行动起来何其艰难!很多时候,我暗暗猜测,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的退化,福州相聚,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。然而,当我捧读玉明的散文集《在时间的河里》时,我发现,她把我们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跟随她细腻的笔触,我走进了她的福州、她的时间之河……

读玉明的散文,首先感到,她是个芬芳的女子。

她在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中写道:“茉莉花的香像涌动的波浪,水一样覆盖了我的全身……仿佛我的呼吸都带着茉莉的香气。”她写《油菜花开遍地黄》:“春风的纤手婆娑轻抚,那些娇柔的花左摇右晃,像是发出了少女般银铃的笑声,如音符在梦键上欢快跳跃,清脆明快。”在《北园路的春天里》,她以特有的视角,指给我看那一树我从没见过的木棉花:“如一个红色的花碗,盛满一碗春光。风铃木黄色的喇叭叭花,倒映在黑色的沥青路面上……”在《种一棵狗尾草》里,她写道:“重生的狗尾草……它释放出的生命活力,如山泉淙淙,如清风拂面,我内心的焦灼和迷茫,也渐渐平息。”

玉明喜欢种花,她甚至从遥远的福州给我送来一束太阳花。我家的阳台上,现在还开着她送的花儿。但直到读了这本散文集,我才知道她喜欢花的缘由。她写的是“一朵花,一棵草,一粒米,其实写的何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生,一波三折,历尽艰辛后,依然心向阳光,蓬勃生长。

她写的是花草树木,也是一个女子的蕙质兰心;写的是“一双慧眼,用心发现,把那些细小的美指给你,也是自己勃勃跳动的生命之歌。

其次,她是个心怀感恩的女子。

她写《寻福记》:“30年,白驹过隙,飞逝而过。我从湖北到福州,从最初的油印工,到打字员,再到内刊编辑,一步一步,每一步都站到了爱的台阶上,我的就业梦圆满而美好。”“那天,阳光很好,我们走出市房产中心大厅,站在暮春的暖阳下,身心都是暖意融融。住新房,一直以为是遥不可及的梦,今天成了美好而真实的现实……”写她遇到困难时,一位陌生的小伙子,用绳子,一端绑住她的车头,另一头绑在他的车后,用电动车拉着她,一直送到东湖大院——她单位的门口。

她是个懂得挚爱的女子。随着她的《走读河口》,感受河口深厚的历史文化;在《百年风华青年会》里,领略青年会的前世今生;她写闽王王审知,写“虎王”胡文虎,写福州的开埠……她写的何止是福州的古往今来,她写的是一个女子的挚爱。她把自己深沉的大爱化为天地间的浩然正气,自豪之本,她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爱着脚下这片土地,她也爱你用眼耳鼻舌身来感受,这是她的有福之州。

她更是一个幸福的女子。她写乡情,写人生的出走与回归,写福州与随州,写他乡变故乡,从此,她有了两个灵魂的栖息地。读着这些情深意切的文字,深切地感受到,玉明写的何止是从福州到随州的思乡之情,她写的是突围、是成长、是收获的漫漫长路,写的是一个女子芬芳的人生四季。她捧出自己,如同季节捧出果实。她如此赤诚地与你相见!

通读全书,玉明的文字朴实而细腻,明亮而干净。她的文字是彩色的,亦橙黄绿青蓝紫,各有千秋,各有色彩。她的文字又是宽阔的,如大海的日出,于细微处起波澜,有着向内追寻的内在于力量。

纸短情长。我的同学赵玉明,虽然身有残障,但她终是用文字铺就了一条宽广的人生大路。祝福她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!

【书林漫步】

女子本芬芳

——读赵玉明散文集《在时间的河里》

■刘爱玲

赵玉明是我的鲁院同学。

打开《在时间的河里》,近70篇散文分成三辑:“走读河口”“桂花馨香”“乘着歌声的翅膀”,饱含深情的文字在这个身有不便的女子笔下,密密编织。那年鲁院相别,几位要好的同学有一个美好约定,其中一个环节,是去福州看玉明。但对于我们这些困在身体里的残障者,行动起来何其艰难!很多时候,我暗暗猜测,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的退化,福州相聚,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。然而,当我捧读玉明的散文集《在时间的河里》时,我发现,她把我们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跟随她细腻的笔触,我走进了她的福州、她的时间之河……

读玉明的散文,首先感到,她是个芬芳的女子。

她在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中写道:“茉莉花的香像涌动的波浪,水一样覆盖了我的全身……仿佛我的呼吸都带着茉莉的香气。”她写《油菜花开遍地黄》:“春风的纤手婆娑轻抚,那些娇柔的花左摇右晃,像是发出了少女般银铃的笑声,如音符在梦键上欢快跳跃,清脆明快。”在《北园路的春天里》,她以特有的视角,指给我看那一树我从没见过的木棉花:“如一个红色的花碗,盛满一碗春光。风铃木黄色的喇叭叭花,倒映在黑色的沥青路面上……”在《种一棵狗尾草》里,她写道:“重生的狗尾草……它释放出的生命活力,如山泉淙淙,如清风拂面,我内心的焦灼和迷茫,也渐渐平息。”

玉明喜欢种花,她甚至从遥远的福州给我送来一束太阳花。我家的阳台上,现在还开着她送的花儿。但直到读了这本散文集,我才知道她喜欢花的缘由。她写的是“一朵花,一棵草,一粒米,其实写的何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生,一波三折,历尽艰辛后,依然心向阳光,蓬勃生长。

她写的是花草树木,也是一个女子的蕙质兰心;写的是“一双慧眼,用心发现,把那些细小的美指给你,也是自己勃勃跳动的生命之歌。

其次,她是个心怀感恩的女子。

发现林义光

1899年秋,身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古董商人兜售的骨头化石上,偶然看到了一些刻划符号,精通金石之学的他顿感此物非同一般,甲骨文从此便被发现。一百多年来,历经几代学者的发掘与研究,学界对甲骨文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在早期的甲骨文研究者中,闽籍学者林义光可称为八闽大地“甲骨研究第一人”。

林义光(? —1932),字药园,福州闽侯人,早年毕业于京师译学馆,曾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,后又在清华学校任国文教员,还曾在山东大学、师范大学担任讲师,著有《文源》《诗经通解》等。

作为清末民初的闽籍学者,林义光的治学领域不仅包含古文字,亦涉及经史。虽然有关其生平的介绍甚少,最早仅可见于1940年日本人桥川时雄所著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:“林义光,字药园,福建闽侯人。毕业于译学馆,他的研究以金文小学知名。曾担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员,中国大学、师范大学讲师。”

所幸有学者在杨树达书信集《积微居友朋书札》中,发现林义光与杨树达曾有信函往来。杨树达在

1932年6月的一封信函后补记云:“此去年林君来简,不久林君以暴病谢世矣,昔哉!廿二年四月十日晨,树达记。”由此才得以知晓其卒年。林义光与杨树达往来信函共有三封,在另外两封信函中,又可知林义光曾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,之后又任教于清华学校。此外,笔者发现在1921年6月北洋政府外交公报中,曾刊出一则委任公示:“邵令,委任林义光为本部主事。”亦可印证其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之实。闽籍易学家黄寿祺曾于1929年进入北平的中国大学文科预科班就读,其高足张善文曾属文叙黄寿祺求学经历,“从杨树达(字遇夫)先生治文字训诂,并从范毓桂、余嘉锡、孙人和、朱师辙、林义光、唐兰等先生接受各种学问”,则知桥川时雄对林义光的介绍所言不诬。

林义光的《文源》刊印于1920年,由于刊行量少、传播范围有限,目前仅见有林义光自印本、抄本、油印本三种。遍查福建省内馆藏,其中福建省图书馆、福建师范大学藏有林义光自印本三册,厦门大学藏有抄本三册,而油印本二册仅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。《文源》是一本以钟鼎金文为主,采辑石鼓文、汉魏碑刻等文字材料对汉字的构形以及本义进行研究的学术性著作。全书一改《说文解字》用小篆作为字头的体例,以金文作字头,共收字头1551个,分十二卷。这样的体例编排十分有创新,故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曾认为《文源》是一部“比

较集中地反映了宋至清代利用金文探求字源的成果”。

除了在体例上进行创新外,《文源》还对中国传统的“六书”之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与阐发。林义光在《文源》中附有《六书通义》一文,该文不仅总结了传统“六书”理论的得失,还创造性地将象形分为全体象形、连延象形、分理象形、表象象形、殷列象形五类,将指事分为表象指事、殷列指事、形变指事三类,又针对形声字提出了“二重形声”的结构。

林义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建树,可见于其1931—1932年发表于《国学丛编》的四篇研究专论:《释裁籍》《鬼方黎国并见卜辞说》《卜辞姤毓即焚惑说》《论殷人祖妣之称》。《国学丛编》是中国大学的学术刊物,章太炎、杨树达、吴承仕等名家经常在该刊物发表意见,而林义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内容,则主要集中于甲骨文研究领域。例如在《卜辞姤毓即焚惑说》中,林义光对甲骨卜辞中的“姤毓”一词进行了考证,认为甲骨文中的“姤毓”即是“焚惑”,并根据《天官书正义》云:“焚惑主死丧,大鸿胪之象;主甲兵,大司马之官。”将“姤毓”解释为“理兵之官”,是跟随商王打仗的军事首领。特别是“毓”字,林义光在文中认为,先前王国维将该字解释作“𪔐”(同“毓”)字,罗振玉释作“洗”字,孙诒让释为“夏”字,均存在一定问题。因此林义光根据青铜器“虢季子白盘”中的金文字形,将该字确定为“毓”。21世纪以来,有学者再次对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